激进传统

1

托马斯·潘恩

本章首次发表是作为对一部潘恩[1]传记的评论而出现在 1961 年的《新政治家》周刊。在那以后又出版了几种潘恩传记，尤其是约翰·基恩写的一种写得更好，但它也必定会引发同样的思考。

稳健的革命，这在措辞上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尽管我们可以用稳健这同一个词来形容一次暴动、一场政变或一个宣言。不管一次革命的公开目标多么有限，天堂圣城②的光芒必将冲破旧势力那看似永恒的大厦而从裂缝中照耀进去。当巴士底狱陷落时，旧世界的种种常规都被束之高阁，男男女女自然也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期待乌托邦的来临。革命者也因而被罩上了千禧年的光环，而不论他们的实际主张是如何强硬或如何谦逊。

这是一个“可以期待任何事情发生”的时代，而汤姆·潘恩正反映了这一彩虹般的时代之光。他所看到的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欧洲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无法与之比拟，而革命这一称号实在不足以描述它的全部特征，它将上升为人类的再生。他认为：“从此以后，目前的时代将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理性的时代，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今这一代人在后人的眼里可谓是新世界的亚当。”美国独立了，巴士底狱陷落了，而潘恩正是这些辉煌事件的代言人。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能够参与两场革命，可谓不虚度此一生。”

然而，这样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天生的革命家，其实际的政治主张却几乎是令人奇怪的温和。他的目标在于“全球的和平、文明和商业”，这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自由贸易商人如出一辙。就经济问题而言，哪怕“仅仅是理论上的改革”，他也刻意否认有这种想法。私有企业在他看来已经十分美好，而“最奏效的办法就是让人类为自己的利益而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对社会罪恶的分析归根结底就是战争和苛税，除了某些时候，军火的利润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超过了对政府高额开支的担心，这一分析依然是苏塞克斯郡一带的中产阶级商人③所遵循的颠扑不破的原则。潘恩对于社会经济最为激进的见解也不过是提议征收 10% 的遗产税用以负担养老金。来到法国后，他也和其他的英国“雅各宾派”一样加入了法国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即使在这样的组织中，他也充当着稳健的角色。

然而潘恩依然是一位革命者，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曾经有一段时间，殷实的工厂主们准备采用竖起街垒的办法（更准确地说，是支持这种做法）以对抗那种偏袒王公贵族而歧视商人的不公正的力量，这一力量阻碍了“文明所应带来的普遍的幸福”。令人惊奇的应该是潘恩作为革命发言人的非同一般的而且事实上可能是空前的成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

其他一些政论小册子的作者有时也会一鸣惊人而博得鼓动家的名声，一时之间成为群众的代言人。而潘恩却梅开三度，他于 1776年出版的《常识》使一直没有阐明的对美国独立的渴望变得明确而又清晰。1791 年，他写出了《人的权利》来捍卫法国革命的理念，道出了大部分英国激进分子的心声。据说此书在几个月内就售出了 20 万册，而当年全英国的人口，包括不识字的

幼童和文盲，也不如今日的大伦敦一个地区。1794 年出炉的《理性时代》则是头一回直言不讳，以平民化的语言宣称圣经并不是神的启示。此后本书就成为阐释工人阶级理性主义思想的经典之作。显然如此三次成功绝非偶然。

这当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潘恩本身就是和他的读者类似的人，他们自我奋斗、自学成才、自食其力，还没有最终分化成雇主和雇员这样的不同阶层。而潘恩学徒生涯丰富，从事过裁缝、英语教师、小职员、烟草商、记者等职业，而且是一个“具有发明才能，希望在英国推广他的机械发明的人”，正是为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些群众说话的一时之选。碰巧，作为发明家和记者，在公众中他有同样不可思议的人缘。工业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单项建筑就是横跨在威尔河上的无墩铁桥④，它的形象曾经出现在当时无数的水壶上，这座全球最早的铁桥就是以潘恩的原创设计为蓝本而建造的，尽管这项工程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对革命事实的发现则使得他如同他的读者一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的确如此，这一发现成就了潘恩。但是在 1776 年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本可能成为文学界的一个小角色，甚至更可能是一个发明家或者失败的实业家，因为应用科学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朋友——但别的人恐怕不会知道他——原本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智者，一个小镇社会的魅力之星，一个运动员和棋牌高手。他们也可能对他嗜好白兰地而略表惋惜，而且时不时的也会对他如此善于欣赏女性魅力却又毫无性生活的现象感到费解而议论一番。如果不是因为机敏过人的富兰克林的推荐使他移居美国，人们就会忘记他的存在。如果他不是时逢革命，得以再生，他的名字只能是出现在古董一般的博士论文中。

但是他的名字终于没有泯灭，尽管他没有过激思想；（然而在法国国民大会中他却是惟一反对）尽管除了当记者时的短暂风光，在政治上他也一直命途多蹇；尽管在正统的自由主义世界他

并没有一席之地；他的名字还是作为典型出现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离经叛道的党派中。因而，他的全集也曾由一位共产主义人士来编撰完成。

但是他没有被忘却，而且相当典型的是，纪念他的人不在正统的自由主义阵营，而是在派系强的政治及神学造反营垒；尽管他除了当记者有过短暂风光之外在政治上一直命途多舛，尽管他没有过激思想，情况却竟然是这样。（虽然他首先倡导共和国，但在法国国民大会中他是惟一公开反对处死路易十六的人），潘恩的传记大多出自左翼作家之手；他的文集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编辑的。

原因何在呢？对于潘恩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不管他们曾经怎么想，依靠发展私人企业而得到拯救终究不是答案。他和他们所公开反对的是挡在“自由”之路上的“特权”；但事实上他们也反对那些把他们抛入贫困深渊的尚未被认识的新的力量。作为手艺高超的工匠、小店主或农场主，他们具有相当独立的意识而把自己看做社会的未来，他们并不是因为深受压迫而命里注定要求革命（比如像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无产阶级那样），而是他们认定作为独立自主的人如果还是失败，将是十分荒谬，违反理性的事。只有等到 20 年后，潘恩型的具有理性思想的手工业者才会通过“全面的联和”以及互利合作的联盟寻找解救之路。但是当时，贫困已经成为他们集体所面临的事实，无从逃避而急待解决。

正是这些自食其力的穷人，潘恩为他们大声疾呼，对他们诉说。在他们看来，他那坚定而骄傲的献身精神比他的分析更有影响，这种执着充满了“高深的理性和感人的力量”，令哲学家孔多塞也甚为钦佩。当潘恩谈起人类的幸福时，他想到的是贫困和不平等的终结。尽管他一直追求减税和自由企业的建立，但革命

的重大问题始终在于：“是否人民可以继承他们的权利，全球的文明能否实现？是否人人可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是否法律能够杜绝劫掠，而国家可以免于悲惨？”正是“在所谓文明的国家我们看到老人在济贫所里做工，而青年被送上绞架。正是贵族统治着广大贫困无助、生活悲惨的底层民众，而他们却被告知他们是快乐的。”

但是潘恩不光告诉他的读者“贫穷是与幸福、文明不相容的”，他也昭示他们理性之光已经降临人类以使他们摆脱贫困，而革命也表明理性必胜。在反叛者中，他是最不具浪漫主义精神的一位。不言而喻的，基于实践的、手工业者的常识将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他发现了理性像一把利斧可以在奴役和无知的丛林中开辟解放之路，单是这一发现就足以成为重大的启示。

透过《理性时代》的字里行间，就像参加了一个几代工人阶级的思想聚会，处处流露着理性的赞歌，因为一旦你下定决心看清事实就会轻易地发现牧师关于圣经的布道，富人对社会的解释都是满纸的谎言。而《人的权利》一书则通篇闪烁着这一伟大真理的显而易见的必然性。伯克⑤认为革命的理性意味着“所有生活中冠冕堂皇的遮羞布将被撕去”，让我们“赤裸的，颤抖的人性本质”连同其种种缺陷毕露无疑。潘恩并不在意理性的赤裸，它将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暴露在无穷可能性的荣耀之中。潘恩的人性就像希腊时代的运动员一样赤裸着，因为它一直在为着奋斗和胜利而做好准备。直至今日，每当我们细读那些清晰、简明的语句，常识也就上升为英雄主义的战歌，仿佛一座稳固的铁桥飞架于塞特福德镇和天堂圣城之间；我们为之欢庆，为之感动。即便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我们怎么能忘记向他欢呼敬礼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注释

1. 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出生于英国后移居美国的政论家。

2. 新耶路撒冷：原指神的寓所，这里指人间的天堂。

3. 苏塞克斯郡是伦敦郊外的一个县，有一批生活方式相同的中产阶级住在那里。

4. 这座桥是世界上第一座铁桥，人们因此制作了大批的盘子、水壶以表纪念。

5. 伯 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

2

砸机器的人

本文的目的在头一页就讲得很明白。它是为英国工人运动辩护，驳斥历史学家 E.P. 汤普森后来所指出的那种“后世的傲慢骄矜”；此外，还可以补充说，也驳斥当今的一些理论家。此文最初发表于 1952 年，载于作者和他的一批友人当时刚创办的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的创刊号。该杂志至今仍畅销不衰。

也许现在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早期工业史中发生的毁坏机器的问题了。有关这种方式的早期工人阶级斗争，误解依然广泛存在，连专业的历史学家也不例外。例如，一本 1950 年出版的优秀作品仍然把砸机器的勒德派运动*描述成一场“毫无意义的、狂热的工业盲动，而另一位在这一领域贡献最大的杰出的权威也把这些在 18 世纪流行于各地的暴烈行动轻描淡写为过度的兴奋和高涨的热情导致的过激的反应。[①]在我看来，造成这些误解的原因在于人们始终坚持 19 世纪早期阐述过的有关采用机器的观点，以及 19 世纪形成的有关劳工和工会历

* 亦译“卢德派运动”。——译注

史的观点，其倡导者主要是韦布夫妇* 及其费边社的追随者。也许我们应该把观点和假设区别开来。在许多有关捣毁机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可以察觉到 19 世纪中产阶级经济辩护士所持有的假设，认为本该让工人明白不管经济的现实多么不如人意也不应该反抗现实；而费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假设则是：在劳工斗争中强硬手段不如和平谈判有效；这两派还都断定：早期的工人运动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在残酷的现实压力下盲目地摸索着作出反应，就好比实验室中的动物对电流刺激作出反应一样。大部分研究者意识到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机械化生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够理解并同情这种长时期的无望取胜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除了小部分受惠的人以外，所有的工人都反对新体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场徒劳无益的运动，失败是必然的。

上述的心照不宣的假设仍有待推敲。意识到的观点则显然蕴涵了不少真理的成分。但同时，这二者都模糊了许多历史的真相。这样就导致人们不可能对前工业时期工人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真正的研究。然而，对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略作观察就会看出，将 1815 年到 1848 年间频繁发生的孤注一掷的反抗与退却的画面回头过远地投射到历史的深处，有多么的危险。其实，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才告终结的那漫长经济繁荣岁月中出现的早期工人运动，在认识上是有限的，组织上也是窄狭的，但在此限度之内，这些运动是不容忽略的，其结局也并非全然的失败。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后来的挫折而变得模糊不清：首先，曾经很有实力的西英格兰毛纺业组织完全烟消云散，

*韦布夫妇，即 Webb, Sidney James（1859—1947）和 Beatrice Webb（1858—1943），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译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全国性工会兴起后才得以恢复元气；其次，在 18 世纪 60 年代还能取得实际上的劳资协议的强有力的比利时毛纺工人行业协会在 1790 年后也消散了，而且直到 20 世纪初为止，工会活动实际上未曾再兴。②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这些早期工人运动的力量，至少是在英国不应忽视；而且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力量的基础通常在于拆毁机器、暴动和破坏财产，我们才能搞清运动的含意。

在广大非专业人士看来，“砸机器的人”和“勒德分子”这两个名词可以互换。这也是自然的，因为在 1811 到 1813 年间，还包括 1815 年滑铁卢之战后的几年，爆发起来的勒德运动，比起任何其他年代的工人运动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且据信也迫使政府出动更多的军队加以镇压。政府用来对付勒德人运动的军队多达 12000 人，大大超过了 1808 年威灵顿远征伊比利亚半岛时率领的英军人数。③人们自然会首先注意勒德运动，但却往往把它和一般意义上的拆毁机器的问题混为一谈，而后者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现象是始于（如果可以说它有一个开头的话） 17 世纪的某一阶段，大约一直延续到 1830 年左右。的确，1830 年那一系列被哈蒙兹称为“最后的工人起义”的农场劳工起义，尽管不可避免地也破坏了相当数量的工业制造设备，但其本质上还是一场反对农场机器的斗争。首先，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而被当做单一的社会现象来对待的勒德运动实际上是涵盖了数种截然不同的砸机器的方式，它们在极大程度上或前或后地都各自独立存在过。其次，勒德运动的迅速失败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砸机器的做法从来没有成功过。

让我们先来考虑第一点。我们看到至少存在过两种砸机器的

的方式，它们和那些因为生活费用的高涨和其他一些不满的因素而导致的一般性的暴动——如 1811 年在兰开夏郡和 1826 年在威尔特郡发生的捣毁机器的事件——是截然不同的。[5]第一种方式对于机器并没有特别的敌意，只不过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一种向雇主和提供原料的发包商施加压力的普通手法。已经有学者指出过，诺丁汉郡、莱斯特郡和德比郡的勒德分子就曾经“将捣毁新旧机器作为迫使他们的雇主在增加工资和其他要求上做出让步的手段。”[6]这种捣毁机器的方式在家庭手工生产和制造业时期以及工厂和矿山兴起的初期是劳资冲突的一种传统的固有的形式。这一方式的攻击对象不光是机器，还有工业原料和制成品，有时甚至是雇主的个人财产，这要看什么样的破坏能造成最敏感的后果。例如，1802 年威尔特郡剪羊毛工人在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骚乱中，烧毁了不得人心的毛衣料商的干草堆、谷仓和狗舍，砍掉了他们的树，捣毁了成批的毛料，最后还攻击并砸烂了他们的厂房。[7]

这种当时流行的“通过集体暴动的方式来和雇主讨价还价”的做法不乏例证。仅以西英格兰的纺织业为例，呢布商们在 1718 年和 1724 年向议会抱怨，说织工们“威胁要拆掉他们的房子，烧掉他们的呢布料，除非织工提出的条件能得到满足。[8]而 1726 年到 1727 年间在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格洛斯特郡和德文郡爆发的争端中，织工们“闯进了（雇主及工贼）家中，捣毁了羊毛，把织机上的布匹剪成碎片并捣毁了工作器具。”[9]这些争端最终以达成一种类似集体合同的协议而宣告结束。1738 年在麦尔克谢姆纺织工人大起义的开端，工人们“因为寇尔特赫斯特先生压低了呢布的价格而剪断了织机上的经纱”，[10]而三年之后，同一地区焦急的雇主们上书伦敦要求保护，因为工人们以烧毁羊毛为要挟，要求他们不得雇佣外人。[11]总之，在这一世纪，这样

的例子连绵不绝。

同样，当矿工们到了不得不向他们的雇主施压的时候，他们也采取了捣毁机器的手段。（当然，矿工暴动的目标依然多半是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这种局面据信是由奸商们一手造成的。）例如，18 世纪 40 年代在诺森伯兰的煤田大骚乱中，焚烧井口机器就成了斗争的一部分，矿工们的工资因此得到了可观的增长。[12]而在 1765 年发生的数次骚乱中，矿工又砸毁了机器，放火烧了煤，他们赢得的回报则是在每年合同到期的时候可以自由地选择下一个雇主。[13]英国议会于 18 世纪后期多次通过了禁止焚烧矿井的法案。[14]但迟至 1831 年，贝林顿（达拉姆郡）的罢工者们依然砸毁了矿井上所用的卷扬机。[15]

另外，由于人人皆知东米德兰地区针织业工人破坏织架的历史，这里就不再赘述。[16]在 1778 年发生的著名的骚乱中，捣毁机器肯定是最重要的斗争武器（可以算是勒德分子行径的原型），实质上它是抵制降低工资的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上所举出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出其他一些例子——都没有表现出对机器本身的敌意。捣毁机器不过是工联运动在工业革命之前及其早期所采用的一种斗争手段。（有些事实，如有组织的工会当时在有关的行业中还几乎不存在，工业革命的来临赋予捣毁机器以新的社会功能，等等，对这一论点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对雇主施加间歇性的压力，比对他们一直保持压力更加有效：例如，当纺织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突然发生变化，或者当矿工和海员一年一度的合同要同时更新的时候采取行动，就比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得不逐渐加以限制的时候采取行动，要显得更合时宜。从独立的小生产者，到家庭承包生产制时期常见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间商，直到工资制已比较成形时的工人，几乎各种人都可以运用这一手段。然而总体看来，它还是和资本主义生产中典型的社会关系所导致的摩擦和冲突有关，这种关系也就是在雇用劳动力的企业主和那些依靠直接或间接地向企业主出卖劳力的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它当时还比较原始，而且还和小规模独立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混淆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的动乱和破坏活动在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的 18 世纪的英国显得比在同一时期的法国更为频繁。[17] 当然，英国的纺织工人和煤矿工人的运动在当时和那些老派的欧洲大陆地区的工匠行会所组织的表面看来似乎具有工会性质的活动是大不相同的。[18]

这种斗争方式的价值显而易见，它既对雇主施加了压力，同时也促使工人基本上保持团结一致。

令人钦佩的是，一位在诺丁汉供职的小镇职员早在 1814 年就在他写的一封信中指出了上述的第一点。[19] 他说针织工正在举行罢工，反对 J 和乔治·雷的工厂。因为这一工厂的雇工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织机，所以他们面临了极易失去工作的危险。然而，大部分的工厂都把织机租给织工，“并通过这种方法牢牢控制着手下的工人。也许能够迫使雇主就范的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工人们捣毁他们的机器，向他们宣战。”在一个以家庭生产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中，小群的人或单个的人分散在大大小小的村庄和庭院中，因此无论如何，都很难想象出还能够有什么别的办法来保证停工有效。此外，要对付那些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地方上的雇主，毁坏他们的财产——或者经常以此相威胁——将十分有效。在织物工业中，原材料和制成品都价格不菲，因此烧掉羊毛和成品就比捣毁织机更值得采纳。[20] 而在半乡村工业中，即便只是烧掉雇主的干草堆、谷仓和房子，也会严重地影响他们的收支。

但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有另一个优点。团结是有效的工联主义的基础，但学习这一点需要时间——即便对于煤矿工人来说（要知道对他们来说，团结起来是很自然的）情况也是如此。而要进一步使它成为工人阶级不容置疑的行为规范的一部分，则又需要更长的时间。东米德兰地区分散的织工能够针对雇用他们的工厂组织有效的罢工，这一事实就表明了一种高水平的‘工会精神’，这一点在当时工业化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而且，收入微薄的男女工人缺乏足够的储蓄来支持他们坚持罢工，往往更容易出现工贼而使罢工失败。所以捣毁机器就是消除这些不利影响的方法之一。只要捣毁了诺森伯兰郡的煤矿卷扬机，或者砸掉威尔士铁厂的鼓风炉，就至少可以保证工厂暂时不能开工。[21]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地方。然而这些被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的掌权者们称为‘暴动’的一系列工人活动都取得了同样的效果。每个人都熟悉这样的场面：来自一家工厂或一个地方的一群积极分子和罢工者们走遍整个地区，交替使用号召和威胁的手段，把大小村庄、作坊和工厂里的工人都鼓动起来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尽管在斗争的早期只需做少数工人的说服工作）。[22]甚至到了后来，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仍然是劳资争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目的不仅在于威慑雇主，而且还可以借此来团结工人，鼓舞士气。在雇佣合同已经签定的时候，东北部地区海员的周期性的骚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3]而现代码头工人的罢工则是另外一个例证。[24]显然这一时期的产业斗争仍很好地采用了勒德派的斗争手段。如果说 18 世纪英国的织工（或者说 20 世纪美国的木材工人）是远近闻名的爱滋事的人，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之所以这样是有其充分的具体的道理的。

有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一位现代的工会领袖里纳尔多·里戈拉的著作中找到证明。他自幼目睹了毛纺工业从家庭作坊生

产到大工厂生产的转变。他在书中写道：

> 应该记住，在社会主义尚未出现的时期，工人阶级只是松散的群体，而并非是一支军队。有觉悟的、有条不紊的、由工会组织的罢工在那时是不可能的。工人们只有靠游行，喊叫，欢呼，发出嘘声，进行恐吓和运用暴力，来进行斗争。尽管勒德运动和破坏生产在当时没有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但还是成为了斗争方法的一部分。[19]

现在我们应该看看第二种捣毁机器的行为，人们一般认为工人阶级是用它来宣泄对于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新机器的敌意，特别是对于那些节省劳力的机器的敌意。当然，新机器无疑引起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即使是在大名鼎鼎的李嘉图这样的权威人士看来，这一情绪也是不无道理的。[20]但是我们应该指出三点。首先，这种敌意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不分青红皂白或是专门针对某种机器的。其次，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做法在实践中也并不是那么强烈，只是在某些地区和部门有例外。最后，这种敌意也并不仅限于工人，大多数公众舆论，包括许多制造商，都有同感。

一、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面临这一问题时的处境，那么第一点就很清楚了。他所担心的不是技术进步这样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怎样防止失业和保持日常生活水平的双重实际问题，这其中除了工资以外，也包括了像自由和尊严这样的非金钱的因素。所以他反对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机器，而是任何对于他上述处境的威胁——首先就是一种威胁到他生活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至于这种威胁究竟是来自机器还是来自其他的什么地方，还要视情况而定。斯皮特菲尔兹地区的纺织工人 1675 年因为反对那些‘由一个人来操作就可以替下 20 个人的机器’而发生了骚乱，

1719 年他们则反对穿印花棉布服装的人， 1736 年他们是反对那些拿低工资的移民工人，在 18 世纪 60 年代是为反对削减工资而砸机器。[27]但是上述这些运动的战略性目标是一致的。在 1800 年左右，西部地区的纺织工人和剪羊毛工人同时行动，前者组织起来反对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多余工人，后者则反对机器。[28]但是在取得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这一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相反，在某些地方，机器的出现并没有把工人置于完全不利的地位，我们发现工人对机器也没有特殊的敌意。对于印刷工人， 1815 年以后所采用的动力印刷机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麻烦。直到以后，排版技术的革命威胁到成批技工地位随之下降，才引发了一场斗争。[29]18 世纪早期和 19 世纪中期之间机械化生产和各种新的设备极大地提高了煤矿工人的生产率，比如说，爆破技术的采用即是一例。但是，由于它们并没有动摇掘煤工人的地位，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抵制技术革新的重要运动，尽管矿工是以保守和爱滋事而远近闻名的。在私人企业中，工人对于产量的限制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这种事情在完全不曾机械化的行业，例如在建筑业中，也是可以发生的，而且确实发生过；它也不是依赖于公开的运动、组织或暴动。

事实上，许多事实表明，工人们反对机器，是相当自觉地反对资本家控制下的机器。例如， 1778 到 1780 年间兰开夏的砸机器的工人对于什么样的机器区分得一清二楚，对于 24 锭或 24 锭以下的珍妮纺纱机他们手下留情，而对于只适合在工厂里使用的大型纺纱机，他们就砸了个稀烂。[30]毫无疑问，英国对于工业资本主义来临之前的社会生产关系比别的地方更熟悉，英国人对此类行为也就比其他的地方较少感到意外。我们也不应把这类事情说得过分。生活在 1760 年的人们仍然远不能理解他们将要面临的经济制度的实质。不管怎样，有一点十分清楚，他们的斗争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技术进步本身。

另外，无论在工业化早期还是晚期，如果把工人对于机器的态度当做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看，他们态度大体上相同，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随着全面机械化时代的到来，在许多行业中，反对某些不受欢迎的机器的做法已经让位于想方设法利用它们来使工人享受到工会制定的标准和条件，同时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使技术引起的失业趋于最小化。看上去这一政策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后[31]和大萧条时期都陆陆续续得到了贯彻，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则更为普遍。[32]不管怎样，即便是在今天，当机器会造成失业危机或降低工人地位时，直接反对机器的例子也同样层出不穷。在以正常方式运作的私营经济中，那些在 19 世纪头 10 年导致工人不信任新机器的原因，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也依然有说服力。

二、迄今为止我们所进行的讨论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回答，为什么抵制机器的规模毕竟是如此之小？这一事实并不是广为人知，因为像贝恩斯和塞缪尔·斯迈尔斯这样一些作家所反映出来的，工业化开拓时期的神话夸大了实际上所发生的骚乱。曼彻斯特人不仅认为他们自己是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经商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更麻烦的是，他们还想充当英雄。在《棉花贸易》一书中，沃滋沃思和曼已经正确地估价了 18 世纪兰开夏所发生的骚乱，把它们降到了一个适当的规模。事实上，在我们的记录中只能找到几次有限的大规模的砸毁机器的运动，比如农场工人，他们可能捣毁了相关地区的大部分的打谷机，[33]还有英国和其他地方由一小批剪羊毛工所发起的有针对性的斗争，[34]也许还有 1826 年所发生的针对动力织机的骚乱。[35]从 1788 年到 1780 年还有 1811 年在兰开夏所发生的砸机器的事件仅限于有限的地区和少数的工厂。（我们看到，1811 年到 1812 年在东米德兰地区所发生的大规模运动完全不是针对新机器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已认为某种程度上的机械化是无害的。许多学者已经指出，[36]大部

分的机器都出现在经济繁荣的上升时期，当时就业率正稳步上升，即便存在反对意见，由于没有充分发展的机会，当时就可以平息下来。当不满情绪重新出现时，他们已经错过了反对新机器的关键时刻。到那时工厂已经雇佣了新的工人来操作那些机器，而原先的手工劳动者已经成了局外人，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胡乱地打击他们的竞争者来发泄他们的情绪。再也不能对机器泄愤了。（当然，除非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像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手工制鞋匠和裁缝一样，依然拥有一块不受大机器生产影响的特殊市场。）在捣毁机器的运动中，剪羊毛工之所以比起其他行业的工人显得更加执著，更为认真，原因之一在于这些技术娴熟、组织有序的工人即使在部分机械化的浪潮之后，也保持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很大一部分控制。[39]

三、早期实业家的神话也使得社会各阶层对于捣毁机器的工人的广泛同情变得模糊不清。在诺丁汉郡，尽管许多小业主对于谁捣毁了他们的机器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一个勒德分子受到公开指责。[40]在威尔特郡，众所周知，许多毛呢业的中间商和小业主都同情剪羊毛工，[41]因此 1802 年骚乱的真正的肇事者就很难找到了。[42]在罗森代尔，甚至在动力织机被工人捣毁之前的数年，商人和毛呢制造商就曾通过一项反对它的决议。[43]在 1830 年的工人起义中，威尔特郡欣登县的一位文员在报告中曾说：“在那些机器没有被暴徒捣毁的地方，农场主却表露了相同的意思。”[44]当时任英国内政大臣的梅尔本勋爵不得不给一些地方官员下达一份措词严厉的通报，批评他们“多次建议停止将机器用于打谷或者其他用途”，指出“机器和其它类型的财产一样应该得到法律保护”。[45]

这也不足为奇。即便在那些以牟利为业的人当中，想法成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也只是少数。那些小店主和地方的小业主并不想要一种无限扩张、积累和技术革命的经济，因为残酷的竞争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